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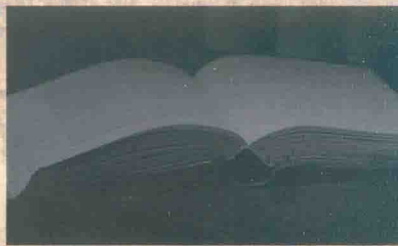
外教社
博学文库

斯特恩式协商

——18世纪中叶英国文学场中的
劳伦斯·斯特恩小说研究

Sternean Negotiations: A Study of Laurence Sterne's Novels
in the Literary Field of Mid-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魏艳辉 著



黑龙江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



外教社
博学文库

斯特恩式协商

——18世纪中叶英国文学场中的 劳伦斯·斯特恩小说研究

Sternean Negotiations: A Study of Laurence Sterne's Novels
in the Literary Field of Mid-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魏艳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特恩式协商:18世纪中叶英国文学场中的劳伦斯·斯特恩小说研究/魏艳辉著.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7

(外教社博学文库)

ISBN 978-7-5446-4743-4

I. ①斯… II. ①魏… III. ①斯特恩—小说研究

IV. ①I561.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7857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方颖芝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890×1240 1/32 印张 7.125 字数 255千字

版 次: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册

书 号: ISBN 978-7-5446-4743-4 / I · 0389

定 价: 25.00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本社调换

博学文库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划为序)

姓 名	学 校
王守仁	南京大学
王腊宝	苏州大学
王 蕾	北京师范大学
文秋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
石 坚	四川大学
冯庆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吕 俊	南京师范大学
庄智象	上海外国语大学
刘世生	清华大学
杨惠中	上海交通大学
何刚强	复旦大学
何兆熊	上海外国语大学
何莲珍	浙江大学
张绍杰	东北师范大学
陈建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胡文仲	北京外国语大学
秦秀白	华南理工大学
贾玉新	哈尔滨工业大学
黄国文	中山大学
黄源深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程朝翔	北京大学
虞建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
戴炜栋	上海外国语大学

出版说明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始终坚持“服务外语教育、传播先进文化、推广学术成果、促进人才培养”的经营理念,凭借自身的专业优势和创新精神,多年来已推出各类学术图书 600 余种,为中国的外语教学和研究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为展示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和成果,并为广大优秀的博士人才提供广阔的学术交流的平台,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外教社博学文库”。该文库遴选国内的优秀博士论文,遵循严格的“专家推荐、匿名评审、好中选优”的筛选流程,内容涵盖语言学、文学、翻译和教学法研究等各个领域。该文库为开放系列,理论创新性强、材料科学翔实、论述周密严谨、文字简洁流畅,其问世必将为国内外广大读者在相关的外语学习和研究领域提供又一宝贵的学术资源。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序言

魏艳辉同学来自辽阔壮丽的黑龙江。她 2008 年秋为求知从哈尔滨到北外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访学进修。翌年通过努力拼搏考上我的博士生。每次见到这位学生,我就想起同样为了追求文学理想的光辉从哈尔滨到北京然后走向更遥远广阔世界的东北女作家萧红。但是艳辉同学比萧红那一代女性更幸运,因为她追求文学理想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女性获得了彻底解放、自由和尊严的崭新时代,也比萧红们走得更远,从黑龙江到北京,再到美国新英格兰的布朗大学。短短数年的读博时光里,沿着这样一条地理路线,艳辉把自己的学术思想之旅拓展到异国的一流高等学府,承受一流学者的启迪和教化,打通中西学问之间的隔膜,深入到精深的文学专项研究领域。因此,在新的学术圣殿中,她不仅能朝夕践行自己的文学理想,而且能不断磨砺自己的思想锋芒,并举理想和理性的红烛,俯仰学术的奇伟高峰和绚丽山谷。如青竹节节攀高,似蝶蛹脱胎换骨,从而为成就终生的志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艳辉的身上我见证了坚韧和执著,也看到了后来者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心气和希望。有这样一位又一位、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学人脱颖而出,是老师的福气,是华夏学术学脉的赓张。

在离开母校北外两年多之后,艳辉将自己博士论文修改扩充而成的专著交到我手上,以这种别样的方式来无声地言说她博士毕业后的新进境,表达对母校和老师的思念和敬意。

艳辉的专著题为《斯特恩式协商——18世纪中叶英国文学场中的劳伦斯·斯特恩小说研究》。这部对英国十八世纪文坛怪杰奇才劳伦斯·斯特恩的研究专著,从研究方法、问题设计和纵横捭阖的论证方面,积极地贡献于我国英国文学研究领域的18世纪英国小说研究。艳辉该著效法西学治学理路,取细微如粟如玉之题材,施精雕细琢之功夫,发鸿博深厚之意旨,有机地融合理论反思与文学个案实证研究、文学文本细读与文学风格诗学探源、文学诗学思考与文化社会图景透视。究其方法论、认识论和知识论上的立意,该著的菁华主要包括:

一、参阴哺阳,同时从法国文化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和德国接受美学宗匠汉斯·罗伯特·尧斯的接受美学思想中吸取营养,将两者相互烛照,有机嫁接,从审美与文化二元之间的动态协商中阐发诗学成因。

二、紧紧抓住英国文学乃至西方文学中的讽刺文传统与小说文类之间的因果渊源,层层剖析,条分缕析,不仅将劳伦斯·斯特恩置于几百年来的西方文学大背景中,而且契合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以及在西方语文学传统中代代相传的风格诗学。

三、将劳伦斯·斯特恩的两部作品平等平行观量,从这两部作品中表现出的审美与文化之间平衡度的变化中阐发作者风格的变化,审美与文化两极之间的张力。这种论述不禁使我想起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论述诗人、作家个体风格变化时的评论:“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才气发扬,应是审美力主导;思虑深沉,应是与文化规范认同趋高。

四、劳伦斯·斯特恩深受后现代文学阐释者青睐,皆因其诡异无常的叙事风格与后现代诗学主张极其吻合。但这种将作家作品从历史文化土壤中剥离出来的方式是否妥当,艳辉的研究以实际行动给出了令人信服的一家之言。但是这种立论立言又有别于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因为艳辉的研究毕竟是在文学自律与文学他律之间求得商榷。这无疑纯粹是纯粹的文学文本分析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为人作序,总是试图发现金子。提笔美言,总是竭力赞誉。如果说艳辉还有什么更需努力的地方,我认为还是在该著奠定的理论范式、18

世纪中叶及之后的英国文坛实景、中西风格诗学这几点上更勤下功夫，以期在学术的进步上“苟日新，日日新”。期待着艳辉同学在真、善、美的道路上越走越敞亮，越来越成熟、淡定。

陶家俊

2016年6月12日于北外东院

前言

劳伦斯·斯特恩是英国小说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位小说家。他身处18世纪后奥古斯都与前浪漫主义转折时期的英国,前接斯威夫特讽刺文学传统,后启欧洲情感主义小说流派,并在20世纪被誉为现代意识流小说和后现代元小说的先驱。这样一位身具多种文学传统印迹的小说家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便具有难懂甚至是晦涩的属性。正是这种复杂性激发了本书对斯特恩作品的探索。

任何文学阐释都是解谜的过程。最初对斯特恩感兴趣主要源于心中的一个疑问。一位18世纪小说家的作品如何会有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小说艺术的痕迹?沉潜于研究文献中发现,自20世纪50年代起所形成的斯特恩研究传统,也都是以这一问题为研究起点对斯特恩进行多角度阐释,尽管路径、方法与立足点不同。基于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发现,斯特恩小说之所以具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小说属性,是由于其异质于英国早期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而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小说实践是在对现实主义小说传统的反思、质疑与挑战基础上形成的。也就是说,两者的共性在于它们同时异质于现实主义小说传统。这种异质性引发了学界关于斯特恩作品究竟是小说还是讽刺文的争议。实际上,斯特恩作品早在18世纪中叶就已经被确认为是小说,如果斯特恩作品具有如此明显的异质性,那么它们在当时又是如何融入18世纪早期小说传统之中的呢?

文学阐释其实包含两条脉络:一是提出问题;二是提出探索并解决问题的方法。

提出问题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去审视研究对象。从巨人脚下攀登到巨人肩上、再立于其上所隐喻的是对已有研究文献爬梳的艰辛历程,在此基础上才能提出要研究的问题。对于经典作家,在审视已有研究传统争议焦点的基础上提出问题,这样的研究比较有价值。原因有两点:第一,焦点问题征兆了作家作品与那一时代的密切关联,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不仅会使我们对所研究的作家作品有新的认识,而且会让人对那一时代的一些关键问题产生新的思考。第二,不同的阐释者由于视角不同对焦点问题的探索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就是所谓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差异会形成一个以阐释者本身为基点代代相传的认知脉络,继而形成传统的继承与延续,最终无限接近对作家作品的真理性认识。这是文学阐释的根本意义所在。

问题提出后应以什么样的视角进行探索?斯特恩作品明显异质于18世纪早期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但当时的评论界却把其划归到这一传统之中。斯特恩在当时是如何评价读者协商,从而促使其接受并认可其作品的呢?这就涉及以作者与评价读者之间的协商为视角探索所提出的问题。斯特恩小说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意识非常明显。这也是18世纪小说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对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对话意识,沃尔夫冈·伊瑟尔、韦恩·布斯以及叙事学理论分别从读者反应、修辞以及叙述等角度进行探索。但上述研究者仅关注作者与阅读者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作者与评价读者之间的关系。因此,文本以作者与评价读者协商为视角来探索所提出的问题具有新意。

采用什么样的视角来探索研究对象其实包含了两方面的活动:一是阐释者本人是如何认识这一视角的。在本文中就是如何认识作者与评价读者协商这一现象的,进一步说就是研究视角背后所隐藏的认识论;二是阐释者如何采用一定的方法推行自己的认识,也就是研究视角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因此,本文包含了两个目的:一是立足于作者与评价读者协商这一新视角对斯特恩研究传统中所显现的关键争议进行再阐释;二是构建作者与评价读者协商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

把批评理论与文学研究相融合。对批评理论的运用并不意味着机械复制已有的理论观点,而是根据研究对象的需要以及自己的认识对其重新进行界定与思考,从而拓展已有理论,发展出新的认识与方法。由于认识与方法较新,因此在绪论部分进行了详细阐述。

以作者与评价读者协商为视角对斯特恩作品的文类属性进行重新探索,发现其作品融合了讽刺文和小说两种属性。斯特恩与评价读者之间的协商推动了斯特恩的作品创作逐渐舍弃讽刺文属性,增加小说属性,最终融入 18 世纪小说传统之中。对研究问题的探索引出了如下发现:第一,小说与讽刺文的兴衰、转化反映了小说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共生关系;第二,斯特恩作品中的怀疑主义是其与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小说精神相通的关键点;第三,斯特恩两部作品的叙事形式与艺术风格具有深层的道德伦理内涵;第四,评价读者参与了 18 世纪英国小说道德伦理属性的形成。上述发现从新的角度深入并细化了已有关于 18 世纪英国小说以及斯特恩作品的基本认识。

任何研究都有认知局限,本文仅代表我博士期间思索的成果以及未来研究的起点。在其出版成书之际,我要借此向曾给我启发的师者群体致以深深的敬意。师之所存,道之所存。学问之道在师生交流中传承,所传承的还有学术理想和学术精神。我所承教的师者群体构建了一个学术的精神共同体。他们内心纯真、治学严谨、自律严格,执着于学术追求,并给予学生最真诚的教导和关怀。这一共同体的存在使我理解学术之崇高,并对学问怀有敬畏之心、向往之意与追求之理想。

感谢恩师陶家俊教授,恩师对我有再造之恩。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经历了博士求学的三个阶段。在研讨课上,老师帮我调整知识结构,并教给我思维与做学问的方法,使我逐渐领悟求学门径;在开题报告撰写中,老师帮我提升选题视野,使论文立意高深;在论文撰写阶段,老师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论文阅读,大到论文、章节题目,小到格式、文字、标点,一一给出修改意见,帮我提取亮点、调整重心。老师的修改瞬间提亮整篇论文,让我看到了更广的认知视野。老师在指导过程中鼓励、关怀与批评并重。他以其宏大的视野与深邃的思想为我的论文提供了一个支点,促使我向深远精细处着力。在恩师的指导下,我见识到了一位热

爱学术的学者所具有的学识、志向和正气,从而不仅在学问上获益,并且深受老师人格魅力的熏陶和感染,更加执著于学术之旅。

感谢保罗·阿姆斯特朗教授。在布朗大学研修期间,阿姆斯特朗教授帮助我系统梳理现象学文学批评理论,推动了本文认识论的产生。感谢北京大学的刘意青教授。刘老师仔细审阅我的开题报告,不仅提出了关键的质疑,而且对措辞、提法、引用等方面的严谨性提出具体意见。最打动我的是她极为细致地阅读了开题报告,有问题的地方,划出来;赞同的地方,打对号;需要补充的地方,进行补充说明,这让我非常敬服于刘老师认真严谨的态度。感谢赵国新研究员。赵老师对文字具有敏锐的感受力,指出了论文写作中不通顺以及翻译文字部分所存在的问题,并指出对理论的阐释需要以自己的话陈述出来。他推荐我阅读名家散文,为我指出了理论写作与提高文笔的路径。最后感谢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王逢振研究员、北京大学的周小仪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张中载教授、王丽亚教授在论文开题与答辩中的细致指导与建议。

本文部分章节的初稿已在《国外文学》、《外国文学》等期刊上发表,在此向有关编辑老师表示感谢。感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论文评审专家的厚爱。感谢哈尔滨理工大学允许我四年时间在北京读博。感谢赵冬臣博士对论文文字和逻辑所给出的最为全面细致的建议。感谢师姐、师妹与朋友们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给予我的关爱。最后,感谢我的家人。整整四年我绝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学习与撰写论文,我的公公婆婆对家庭和幼小女儿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能够脱身于繁琐的家务,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之中,感谢他们无私的奉献。感谢我的父母一直以来的鼓励与支持。感谢我的爱人和我的女儿对我始终如一的爱!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劳伦斯·斯特恩小说国内外研究综述	2
第二节 审美—文化双维度的文学接受研究：对尧斯与布迪厄的 理论融合	22
第三节 理论价值与研究意义	40
第一章 文类协商：18 世纪中叶英国文学场中的劳伦斯·斯特恩 ...	42
第一节 斯特恩与出版商的协商	43
第二节 斯特恩与两个文学俱乐部的协商	49
第三节 斯特恩和文学评论期刊的协商	66
第二章 叙事协商：《项狄传》的逆反生成结构	83
第一节 对话中越界：《项狄传》中的评价读者意识	84
第二节 对话中质疑：《项狄传》的前进—离题情节模式	97
第三节 《项狄传》的情节模式与隐匿的社会伦理制约	114
第三章 道德协商：《情感之旅》的顺应生成结构	130
第一节 情感主义的哲学思考	131

第二节 对话中呼应：《情感之旅》中的感性美学及其道德之维	145
第三节 对话中迎合：《情感之旅》中的欲望—节制模式	163
第四节 《情感之旅》的道德主题与隐匿的反讽	175
结论	188
参考文献	198

绪 论

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 1713—1768)共发表过两部小说:《项狄传》(1759—1767)和《情感之旅》^①(1768)。这两部小说奠定了他在英国小说史乃至欧洲小说史上的经典小说家地位。他身处后奥古斯都与前浪漫主义转折时期的英国,前接斯威夫特讽刺文传统,后启欧洲情感主义小说流派,并在20世纪被誉为现代意识流小说和后现代元小说的先驱。而在18世纪中叶,斯特恩就已经是与塞缪尔·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齐名的小说家。正是斯特恩作品的独特性使其与多种文学传统产生关联,而这种关联性引发了斯特恩评论和研究中对其作品与18世纪中叶小说传统之间的异质性的思索,进而导致关于其作品文类定性的争议。但已有研究往往从作者意图出发来界定其作品的文类属性,缺乏对读者接受维度的考察。本文试图从作者创作与读者接受之间协商关系的角度,重新思考评论界关于斯特恩作品的文类争议。在18世纪中叶的英国文学场中,作者创作与读者接受之间的协商关系极为特殊,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对斯特恩作品的接受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我们

^① 《项狄传》全名是《绅士特里斯特拉姆·项狄的生平与见解》。《情感之旅》的全名是《约里克先生穿行法国与意大利的情感之旅》。后文将全部使用简称。《项狄传》又译《商第传》;《情感之旅》又译《多情之旅》、《感伤的旅行》、《感伤之旅》、《深情之旅》或是《多情客游记》。

可以从新的角度来看待一直以来斯特恩研究领域内的争议问题,即如何对其作品进行文类定性;其次,可以重新思考英国早期小说史的发生过程,并对斯特恩在小说发展史中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估。

第一节 劳伦斯·斯特恩小说国内外研究综述

整体而言,斯特恩小说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前的斯特恩小说评论和20世纪50年代后的斯特恩小说研究。第一阶段主要是文化界名人或评论者对其作品的评论,往往十分简短,并不深入;第二阶段是对斯特恩作品系统研究的阶段。贯穿两个阶段的一个核心主题就是斯特恩小说与18世纪小说传统之间的异质性问题。

一、20世纪50年代前的斯特恩小说评论

1759年斯特恩46岁时踏入文坛出版《项狄传》第一、二卷,从籍籍无名的小镇牧师一跃成为当时伦敦文化圈内的闪耀新星,并跻身著名小说家行列。当时的权威文学评论杂志《每月评论》的评论者威廉·肯里克(William Kenrick, 1725—1779)发表首篇评论,“整体而言,我们斗胆推荐项狄先生。身为作家,他比现在任何小说家都更加想法独特与令人愉快。他所创造的人物使人印象深刻并奇特非凡;他的观察中肯敏锐;除少数例外,他的幽默从容而真诚。”^①这篇评论意义重大,它代表了伦敦文化圈对斯特恩在人物塑造和幽默表达方面的赞誉,为斯特恩后来的声名鹊起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评论者把斯特恩界定为小说家,这决定了评论界将以小说创作标准来衡量斯特恩的作品。

肯里克对这样一位初登文坛的作家给予如此高的赞誉,足见对《项狄传》创新性的认可。18世纪中叶有三部畅销成为阅读“风尚(vogue)”的小说:理查逊的《帕梅拉》(1740)、菲尔丁的《汤姆·琼斯》(1749),再

① Alan B. Howes, *The Critical Heritage*, pp. 47-48.

就是斯特恩的《项狄传》(1759)。^①《项狄传》出现在18世纪50年代的文坛空档期。菲尔丁1754年去世,同年理查逊封笔,文坛充斥着对两人作品的粗劣模仿之作。在整个文坛呼唤创新的情势下,斯特恩将塞万提斯(Miq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 1493—1553)讽刺文传统蕴染上英国式幽默色彩,创造出特色鲜明的人物形象。同时,他的离题(digressive)叙事模式又打破了理查逊、菲尔丁所建立的线性与因果关系叙事传统,带给读者全新的阅读体验。这两方面的创新使他受到评论界的力捧。

在《项狄传》第一、二卷大获成功后,斯特恩趁热打铁以《项狄传》中牧师约里克的名义出版他早前写的布道词,不料引起轩然大波。评论者意识到斯特恩的牧师身份后,对《项狄传》的接受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认为《项狄传》中大量性暗示所表现出的轻佻笔法与斯特恩的牧师身份极不相称,对《项狄传》的评论开始出现批判与攻击,甚至全盘否定之语。有人评论:“文中充满技术术语和断断续续的句子,陈腐的讽刺与淫秽低级的打诨缺少机智幽默,并且整部作品缺少计划构思。”^②《约里克布道词》第一、二卷的出版使评论者意识到《项狄传》与当时的小说传统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形式上,没有计划构思;在内容上,缺少道德意图。

《项狄传》是否真的没有计划构思?实际上,斯特恩在《项狄传》的第一、二卷中就明确表明了他在前进—离题(progressive and digressive)叙事模式方面的思考以及这种叙事形式对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哲学中“观念联想”(association of ideas)概念的借鉴。^③近代学者在对这部作品的时间、前后一致性和离题艺术进行考察后,亦指出这是一部经过精心构思的作品。^④而早期评论界之所以如此评价是因

① Lodwick Hartley, *Ster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p. 13—14.

② Ibid., p. 77.

③ 分别参见劳伦斯·斯特恩:《项狄传》,蒲隆译,第71—72页、第82页。

④ 分别参见 Theodore Baird, “The Time-Scheme of Tristram Shandy and a Source”, Wayne Booth, “Did Sterne Complete Tristram Shandy?”, William Bowman Piper, “Tristram’s Digressive Artistry”。